

近代上海的崛起 與廣州的失落

• 樂 正

一個角色與兩個城市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以對外開放著稱的口岸城市，它們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扮演過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和遠東國際大都市的角色，這兩個城市就是廣州與上海。

廣州與上海，一個地處嶺南珠江下游，一個位於華東長江出海口，儘管它們分屬於不同的江河流域和地域文化圈，但我們不難從兩者之中找到一些共性。鴉片戰爭前的廣州與上海雖然都是封建社會中的城市，但與古代都城相比較，穗滬兩地無論從地理上或是心理上，都遠離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心，從來不是中國封建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地。在經濟上，穗滬兩地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是一種「邊緣經濟」。明清時期，穗滬兩地所處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都是物產豐盛、經濟富裕的地區，當地的農副產品的商品率較高，市場功能較完善，居民對市場的依賴較為普遍，且有精明的經商本領。商業、手工業、航運業的發達，經濟腹地物產豐盈，使清代的廣州與上海經濟冒出許多資本主義的新芽，是中國最富有資本主義發展潛質的地區。

古代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從建城歷史看，廣州比上海歷史悠久，上海是一個縣治所在地，在全國只能算是三流城鎮，而廣州是嶺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早在漢代就被史家列為全國九大都會之一，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都遠高於上海。鴉片戰爭前，上海城鎮人口不超過20萬，而廣州人口已達80-90萬，是僅次於北京的全國第二大城市。最重要的是，穗滬兩地的經濟功能有明顯不同。上海的商品經濟優勢，主要表現在手工業和國內貿易方面，對外貿易並不發達。而廣州是古代中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對外通商兩千餘年，經久不衰，從未間斷。早在唐代，廣州就已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市之一。在清代，廣州仍是全國最大的外貿口岸，1757年始，又成爲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從1515年第一批西方商業冒險家到達廣州起，到鴉片戰爭爆發，廣州已經和西方人打了三百二十五年的交道。因此，古代廣州在外貿和對外開放

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比上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接受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但鴉片戰爭以後，廣州很快失卻了開放的許多優勢，而上海則在新的開放格局中迅速崛起，並取代廣州，成爲近代中國外貿和對外開放的中心城市。

方面所形成的歷史傳統與優勢，是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遠遠不能比擬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應比上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接受近代資本主義文明。

但近代的歷史否定了這一種可能。鴉片戰爭以後，廣州很快失卻了開放的許多優勢，而上海則在新的開放格局中迅速崛起，並取代廣州，成為近代中國外貿和對外開放的中心城市。

歷史性錯位發生在近代

穗滬兩地是如何在近代的開放浪潮中發生歷史性錯位，一個失落，一個崛起的呢？

我們先看外貿方面。廣州是古代中國的外貿中心，鴉片戰爭後，情況發生變化。十九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外國洋行開始陸續到上海探路，上海的外貿隨之起飛。相比之下，廣州同期的外貿額卻明顯下降，到1854年，已落在上海之後。此後，廣州外貿不僅未能追上上海，而且差距越來越大。1871-1873年廣州的外貿額只相當於上海的1/5，1929-1931年，跌至1/9，1947年為1/13.8^①。在進出口航運方面，古老的廣州港也落在了上海港後面。1849年，廣州港的進出口運輸噸位約28萬噸，上海港僅為9萬噸，但到1863年，廣州港為60萬噸，上海港則已增到196萬噸^②。1911年，廣州港為480萬噸，上海港已達到1,851萬噸^③。廣州只有上海的1/4強。

廣州外貿額在全國外貿總額中的比重也大幅度下降，由鴉片戰爭前的100%，降到1860年的33.5%，1911年的8.3%，1925年的5.1%，1939年的0.3%，1947年的5.1%^④。可見，廣州不僅失去了中國外貿中心的地位，遠遠落在上海的後面，而且由於香港的崛起，廣州甚至不能說是華南地區的外貿中心。近代上海外貿崛起之快，與廣州外貿下跌之速同樣令人吃驚，在各通商口岸中同樣都是獨一無二的，成為近代中國對外貿易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現象。

在對外開放的其他方面，廣州也出現了各種不景氣現象，而上海則後來居上，超過廣州，成為中國近代最開放的城市。

我們先比較駐穗滬兩地的外商機構情況。鴉片戰爭前，外商駐華機構幾乎全部設在廣州，1837年已有156家^⑤，而當時的上海一家外國洋行也沒有。鴉片戰爭後，廣州外貿發展並不理想，駐穗的外商機構便紛紛將其移至香港和上海，出現外商轉移現象。請看表1^⑥：

表1 駐滬穗外商數目比較

年份	全國	上海	廣州	廣州在全國位次	廣州／全國	廣州／上海
1891	547	280	47	3	1/11.6	1/5.9
1901	1,102	432	58	5	1/19	1/7.4
1911	2,863	643	102	7	1/28	1/6.3
1921	9,511	1,741	168	9	1/56.6	1/10.3

近代廣州洋行不僅數量少，而且檔次下降，過去駐穗外商機構多是公司總部，近代則基本是二三級的分公司。

隨着貿易地位的下降和外商機構的轉移，近代廣州的外僑人數也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1838年，駐穗外僑有307人，1859年減少到172人。而駐滬外僑人數則由1842年的25人增至1859年的408人^⑦。此後滬穗兩地外僑人數的差距日益擴大。請看表2^⑧：

表2 滬穗外僑人數比較

年份	全國	上海	廣州	廣州在全國位次	廣州／全國	廣州／上海
1891	9,067	4,956	424	3	1/21.3	1/11.6
1901	19,119	8,296	577	8	1/33	1/14.3
1911	153,522	30,292	1,324	11	1/116	1/22.8
1921	240,769	31,893	1,647	14	1/146	1/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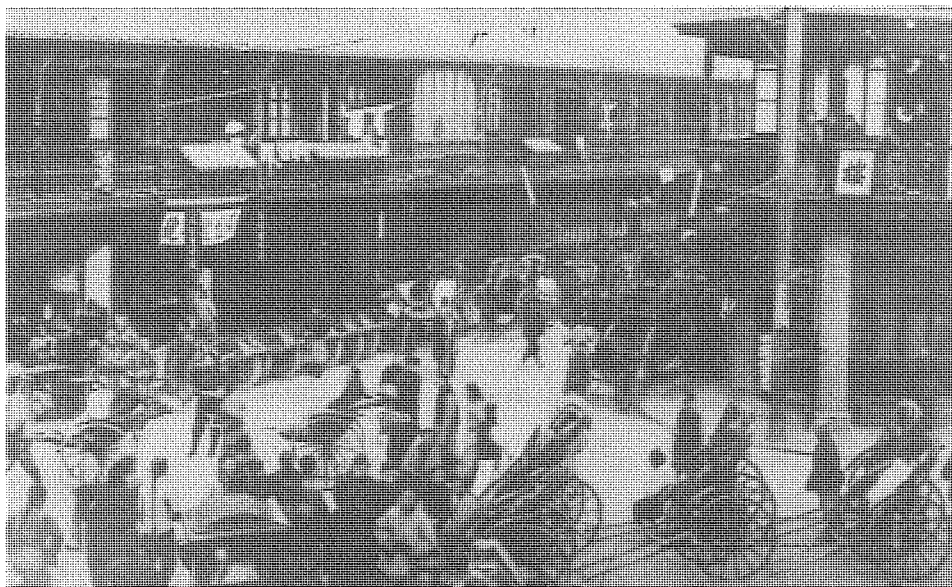
20年代以後，廣州的外僑人數不僅沒有明顯的增長，反而明顯減少。1924年為660人，1946年為250人，1949年為900人^⑨。相比之下，上海外僑人數增長很快。1910年，上海租界的外僑達1.4萬人，1930年為6萬多人，1942年曾一度達到15萬人^⑩。

洋行、外商的大轉移，也導致了廣州買辦的轉移。廣州本是中國買辦的搖籃。但自從「十三行制度」廢除後，「廣東買辦像食客一樣跟着外商到各口岸去。外商去新開口岸時，通常帶上他們的買辦和其他僱員」^⑪。一時間那裏有外國洋行，那裏就有廣東買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國的生意場中，所謂「廣東買辦」，已不是指在廣州的買辦，而是指活躍在中國其他口岸的廣東籍買辦。吳健彰、徐潤、鄭觀應、唐廷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實上，近代的廣州已不再是買辦的大本營了。

廣州開放優勢的失落，還可以從廣州租界與上海租界的對比中反映出來。近代中國通商口岸中的外國租界，體現了東西方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一個象徵。但從本文的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視其為衡量近代中國城市開放度的標尺。與上海租界相比，廣州沙面租界有以下幾個特點：一、開闢時間較晚。上海第一塊租界是在宣布開埠後兩年左右簽約建立，而廣州的第一個租界協議是在宣布開埠十九年之後才簽約的。結果，上海開埠晚，租界建立早，廣州開埠早，租界的建立則比上海晚了十六年。二、租界面積較小。作為一個大的通商口岸（晚清廣州人口規模居各口岸之首），廣州沙面的租界面積只有330畝，其中英租界264畝，法租界66畝。而當時的上海英法租界面積約為2,000畝，虹口美租界面積也不小。問題還不止於此，上海租界幾經擴展，面積不斷擴大，最後達到48,653畝，相當於舊城區面積的十多倍。而廣州租界卻一直沒有任何擴展，幾十年保持不變。所以，進入本世紀之後，廣州租界面積僅上海租界的1/147。三、租界中的居民很少。如前所說，上海外僑明顯多於廣州，而且早在十九世紀50年代後期，上海租界就出現了華洋雜居

近代中國通商口岸中的外國租界，體現了東西方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一個象徵。但我們也可以視其為衡量近代中國城市開放度的標尺。

在不久的時間內，上海從一個三級縣城一躍而為全國貿易的中心點，箇中原因足堪深究。



的局面，華人可以入住租界，使上海租界的居民人數不斷增加。1930年，租界人口達到145萬人，佔上海人口的48.8%^②。上海租界的人口數量超過了當時廣州全市人口數量。而廣州沙面租界一直是個純粹、小型、自我封閉的外僑居住區。相信在近代大部分時間裏，沙面租界中的外僑人數不超過2,000人。除了大約4,000名中國職員、工人和傭人外，租界是不允許華人進入，更不准華人居住的^③，因此，沙面租界的實際居住人數應該不超過6,000人。正因為人數少，所以，租界面積雖然不大，仍顯得空曠、寧靜，「一派田園風光」，與上海租界的繁華、擁擠、喧鬧情景形成鮮明對比。四、廣州租界的社會功能比較單一。租界中除了19個外國領事館和一些外商機構外，只有一個工部局、巡捕房，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堂、生活服務設施等。租界中沒有商業街、沒有工業區，文化、教育、傳媒機構均少。而上海租界擁有為數眾多的各類社會職能機構，是一個功能齊全的大都市社區。五、租界對廣州城市發展與建設的影響不大。上海租界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就發展成為上海新的城市中心和主體，有一種反客為主的明顯趨勢。據統計，1933年上海租界內的店舖有3.4萬家，1935年上海租界內的工廠有3,421家，都佔全市相當大比重^④。至今上海最繁華、最具氣派的市中心，仍是當年的租界所在地。但廣州一直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沙面租界的建立對西關商業區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對近代廣州城市的整體發展影響不大。沙面租界一直是自我封閉的外僑生活區，它從來都沒有「繁華」、「熱鬧」起來，也從未成為廣州新的城區中心。

最後，我們再看看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廣州與上海的差別。在近代早期，廣州曾是外資注入中國最早的地區，中國最早的外國洋行、銀行、保險公司、報刊和近代工業企業都出現在廣州。但這些企業都好景不常。十九世紀60年代以後，外國在華投資的重心明顯轉移到上海、香港等地，廣州不僅新開設的外資工廠極少，而且原有的船廠也沒有繼續辦下去。甲午戰爭後，外國資本加快了對華工業投資的步伐，1895-1913年間，外資在華製造業共設廠115家，其中廣州一家也沒有^⑤。近代廣州究竟有多少家外資工廠，目前尚缺全面

的統計，根據現有的資料初步判斷，數量奇少，累計不超過20家。而且這些企業中沒有一家大型企業，在資本、規模、技術、產值等方面都不足以成為廣州近代的龍頭企業。這些外資工業企業大部分是在近代的初期創辦，到民國年間存留下來的極少。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外資在廣州興辦工業的實例極為罕見。根據陳真等合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提供的統計數字，近代列強在華設廠1,322家，在能核實所在地的544家中，上海有263家、廣州7家。廣州廠家數只是全國的1/77，只佔上海的1/37。上述的統計數字不一定全面，但基本上是能說明問題的。

從上述幾方面情況看，近代廣州與上海之間發生了歷史性錯位。一個在開放中失落，一個在開放中崛起。上海迅速取代廣州，成為近代中國外貿和對外開放的中心城市，而廣州正日益淪為中國二流的外貿和開放城市。近代上海城市發展起點低、速度快、變化大，由一個20萬人的縣城，成長為有500多萬人口的遠東國際大都會，而廣州近代的發展起點高、起步早，但發展速度慢，後勁不足，城市規模沒有大的飛躍，在全國城市中的位次，由第二位跌至第四位。

錯位的發生是必然的

近代廣州與上海之間發生歷史性錯位的原因何在？我認為有三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廣州與上海所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貿易體系和社會經濟制度。

兩者的開放優勢具有不同的性質，因此，近代廣州與上海的興衰交替，是新舊兩種體制衝突、較量、演進的必然結果。

古代廣州地區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對外貿易歷久不衰，是一個開放度較大的國際性口岸城市。但是，古代廣州所代表的卻是一個從整體上看商品經濟不夠發達，對商業貿易並不鼓勵，開放度非常有限的農業帝國。因此，古代廣州的外貿優勢，是整體的農本經濟體制和局部的商品經濟發達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邊緣經濟形態」。古代廣州的開放優勢，恰恰是以整個國家的不夠開放為背景和前提的，因而是「不開放中的開放」。對西方人來說，廣州不僅是中國唯一的門戶與通商口岸，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貿易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象徵，即「廣州制度」。廣州制度有兩個基本特徵：第一，廣州貿易是中國政府的經濟行為，是以我為主的對外貿易。貿易的主動權、管制權掌握在中國政府和中國商人手中；第二，廣州貿易是農本經濟主導下的貿易，自給自足的經濟邏輯使中國政府並不刻意去追求或鼓勵貿易的發展，相反，經常對貿易的正常發展加以種種限制。因此，西方人常感到廣州貿易制度是貿易保護和貿易限制制度。在鴉片戰爭前，「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就是這種制度的象徵。當西方人急於要

古代廣州所代表的是一個開放度非常有限的農業帝國。對西方人來說，廣州不僅是中國唯一的門戶與通商口岸，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貿易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象徵，即「廣州制度」。「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就是這種制度的象徵。

從廣州衰落到上海崛起的轉變，即是貿易主權的轉變，又是貿易性質的轉變，它反映了中國由獨立而半封閉的農業帝國，轉向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開放國家的歷史演進過程。

廣州在鴉片戰爭前能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是政府經濟決策的結果。從政府的角度考慮，在廣州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既不會傷害內地的農本經濟，也不會影響中央的朝廷政治，外國商人不能進入中國的首都和心臟地區。

擴大對華貿易，要把中國拉入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體制之中時，古老的廣州貿易制度就成為必須首先廢除的巨大障礙。

以上海為代表的近代中國外貿與開放，與廣州有本質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外貿體制是否定廣州貿易制度的結果，前者是在後者的廢墟上崛起的。首先，古代廣州以我為主、獨立發展的外貿體系，在近代中國外貿中已蕩然無存。上海外貿發展是中國屈從於外部壓力和衝擊力的結果，我曾經把這種外部的作用力稱為近代的空間橫向運動系統^⑩。這個系統是在西方近代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擴張浪潮中形成，它反映了西方人試圖衝破一切民族壁壘，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化的世界貿易體系的慾望。鴉片戰爭使西方人擺脫了廣州制度的束縛，變公行制度為自由貿易，變一口通商為多口通商。在這個歷史性轉變中，西方人選擇了上海、香港作為他們在華商業發展的主要基地，而漸漸把廣州擱置在一邊。在由廣州到上海的演變中，中國的外貿自主權、開放主導權丟失了，西方人不僅成了中外貿易的主角，而且成了這種貿易的主宰，是西方人的洋行而不是中國人的公行，成為中外貿易的「導航員」。

其次，廣州的貿易制度是農本經濟體制的「邊緣經濟」，由其制約並為其服務。而上海的外貿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衝破了農本經濟的束縛，將自己置於農本經濟的缺口上。上海引進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將其與內地的封建農本經濟結合在一起，並用前者的力量去影響、改變後者，使後者去適應前者的發展需求。因此，近代上海外貿對中國舊式經濟制度來說，不是邊緣經濟，而是一種「缺口經濟」，它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與大本營。

總之，從廣州到上海的轉變，即是貿易主權的轉變，又是貿易性質的轉變，它反映了中國由獨立而半封閉的農業帝國，轉向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開放國家的歷史演進過程。

二、廣州與上海不同的商業價值，決定了他們的近代命運。

從一定意義上說，廣州在鴉片戰爭前能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是政府經濟決策的結果。從政府的角度考慮，在廣州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既不會傷害內地的農本經濟，也不會影響中央的朝廷政治，外國商人不能進入中國的首都和心臟地區。廣州的邊緣地理位置，竟成為其作為中國外貿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將四口通商減少到一口通商時，保留了廣州，而沒有選擇上海，就有這方面的考慮。一些西方人就認為：「中國之所以選定廣州，因為它位於帝國的東南邊疆，並且，所屬的省份在地理上可以和帝國的其餘部分分開。」^⑪鴉片戰爭後，中國外貿的主導權、選擇權落入西方人手中，西方人自然按照其商業利益和對華貿易戰略來選擇在華發展的基地。在西方人的眼中，上海的條件是誘人的。上海位於中國經濟命脈地區——長江的出海口和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中段，地理位置很好，港口條件也不錯。商船既可南北航行，又可東西進出。對中國內地的交通，其可達度和輻射影響能力明顯優於廣州。有了上海，不僅易於獲得中國絲茶，更可控制中國的長江和沿海這兩條經濟發達帶。從這個角度看，廣州的商業價值遠不及上海，西方人熱衷於上海的發展，是不足為

奇的。一百年前的《粵海關十年報告》中就這樣評價廣州的失落：「應該承認，這座城市——第一個並長時間唯一與西方交往的城市——按照外國人的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勝任所賦予它的『角色』的。它的內陸航道的聯繫範圍，西到雲南邊陲，北邊到貴州、湖南和江西一隅，作為推銷進口商品和生產出口商品的自然區域，可以說是很有限的。」^⑮更何況英國人獲得了香港之後，在華南已有了一個受其支配的貿易口岸，再圖廣州的發展，當然沒有太多的商業價值。

三、鴉片戰爭後，西方人在廣州遇到的麻煩和障礙明顯多於上海。

近代中西關係從一開始就因鴉片這個不祥之物而出現矛盾和衝突。而鴉片走私、禁煙運動、鴉片戰爭都首先在廣州地區發生，使廣州深深陷入中西衝突的漩渦之中。1838年12月，憤怒的廣州市民因不滿西方商人破壞禁煙運動，包圍並襲擊了駐廣州的外國商館。1839年，為了迫使英商交繳鴉片，林則徐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查封英國商館和商船。1840年6月，英國發動侵華戰爭，廣州地區進入戰爭狀態。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多次炮擊城區，出兵四郊，劫掠騷擾鄉民，並一度佔領廣州城。西方人的侵略行徑，使廣州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因而激起廣州人民的堅決抵抗。他們發動了三元里抗英鬥爭，張貼抗英文告，組織社學團練，兩次焚燒外國商館，多次襲擊英軍據點，使侵略軍在廣州不得安寧。戰爭結束後，廣州人和西方人之間的敵視情緒絲毫沒有緩和。當英國人不斷提出租地、入城、擴展商館的要求時，廣東官員冷淡處之，廣州市民萬眾一心，一致反對。英國人想以武力相威脅，廣州人眾志成城，表現出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使英國人的企圖一直無法實現，感到「民眾的壓力使人透不過氣來」。戰後十餘年間，廣州舊制度被打破了，新制度卻遲遲未能建立起來，西方人期待擴大在華貿易的願望在廣州並未如願以償。1856年，西方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強行佔據十三行地區後，拆毀了附近大片民居和店舖，再次激起廣州人的憤怒，第三次焚燒外國商館區，將其夷為平地。英軍採取報復行動，縱火燒燬商館區東西兩側繁華的商業區，被毀房屋達數千棟，市民損失慘重。1857年冬，英法聯軍攻佔廣州，俘獲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等官員，對廣州實行了三年零九個月的軍事佔領，因而進一步加深了廣州人民對侵略者的仇視與反抗情緒。

回顧1840–1860年間廣州地區的中西關係，一直是處於高度緊張或戰爭狀態中，西方人軍事征服的強力，和廣州人保衛家園、抵抗侵略的爆發力長時間對峙，互不示弱。有的西方學者稱：「外國人的鹵莽、自大與廣州人的自信、仇外恰是旗鼓相當。」^⑯但在某些西方人的評論中，十九世紀中葉廣州中西關係中的嚴重障礙，是由新舊制度間的矛盾和廣州人的好鬥性格造成的。他們認為：「廣東人的毀壞商館正是外國人破壞舊廣州制度一個得當的報應。」^⑰西方人還喜歡把廣州人說成有桀驁不馴的叛逆、好鬥性格。1897年倫敦出版的一本《南中國遊記》中，對廣州有頗多觀感，其中寫道：「廣州人是天生兇猛好鬥愛作亂的。他們體格強有力，在智力方面也強於中國其他地區的人。」^⑱有的西方人特意把廣州人與上海人做了一番比較，稱：「上海人和廣東人，不但口語像

在西方人的眼中，有了上海，不僅易於獲得中國絲茶，更可控制中國的長江和沿海這兩條經濟發達帶。從這個角度看，廣州的商業價值遠不及上海，西方人熱衷於上海的發展，是不足為奇的。

若能摘除「帝國主義陰謀」的有色眼鏡，我們都得承認，外僑對近代廣州與上海的經濟發展，實有不少貢獻。



兩種歐洲語言那樣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徵也是那樣的各不相同的。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自古以來上海人一直是順從當權的地方政府的，而廣東呢，卻隨時在醞釀着政治陰謀和叛變。對於排外運動，廣東人在許多事件中，特別在鴉片戰爭以後，對於外僑曾表示強烈的憎惡；如果他們對於外僑能夠表示冷淡，我們就認為是很好的人了。而上海人呢，雖然他們不是本性上願意和外僑親善，但至少願意和外僑作半推半就的接近。^②西方人的這些評價，表明廣州正在由一個令他們嚮往的城市，變為令他們惱火和心寒的城市。相信這種心理上的障礙與陰影，對於西方人放棄在廣州發展的慾望起了重要作用。

相對而言，當時的上海卻使西方人感到有些可親可愛，因為他們在這裏遇到的麻煩，遠不像廣州那麼多。40年代西方人在廣州得不到的東西——入城、租地、建立租界等權益，在上海比較輕鬆地得到了。進入50年代以後，西方人繼續在上海投石問路，試探上海的發展潛力，而形勢比他們想像的更好，上海的貿易額急劇上升，很快超過廣州。而且，租界生活安全、自由、愉快，像一個「自治共和國」。業餘劇社、新皇家劇院、西式教堂、跑馬廳等，相繼在租界出現，使上海很快成為西方人在遠東的一塊樂土。1854年7月5日公布〈上海租界地皮章程〉，使上海租界又有了行政和司法的自主權。買辦出身的上海道台吳健彰、洋務官僚李鴻章與西方人關係之好，與兩廣總督葉名琛形成鮮明對比。1853年爆發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和1859—1860年間太平軍東征，對上海的西方人來說，都是有驚無險，並沒有遭到有意的攻擊。倒是西方人乘機攫取了至關重要的上海海關控制權。並由於大量華人湧入租界，造成華洋雜居的新局面，使租界獲得一次意外的發展機會^③。

總之，1840—1860年，是西方人調整在華發展戰略，重新確立對華貿易支撐點的重要時刻。在這一時期，西方人在上海的發展要比廣州順利得多。正如英國駐香港總督兼任駐華全權大使德庇時訪問上海時所指出的，在這裏「華洋商人友好無間，非如粵埠，華洋人民積有芥蒂，遇事有不能融洽之虞也」^④。在廣州的硬環境不及上海的情況下，廣州對外開放的軟環境——中西關係——也不及上海。西方人放棄在廣州的發展，而專心於經營上海和香港就

更有理由了。十九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勢力在上海的發展十分迅速，使上海向國際化大商港邁進。

由於廣州與上海在近代開放中的遭際不同，使其地位發生歷史性錯位，導致這兩個城市在近代的命運大相逕庭。上海不僅成為近代中國的外貿中心，也是近代中國的工業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樞紐，它還是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搖籃和城市建設近代化的先行者。當然，由於上海的崛起是受了外力的巨大作用，因此，上海也是西方列強欺壓掠奪中國的象徵，是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典型。近代廣州的外貿功能相對減弱，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雖高，起步雖早，但速度並不快，後勁有些不足。

近代廣州的新優勢

作為一個口岸城，近代廣州雖有失落，但並沒有衰落。經過一段痛苦而自然的歷史整合，廣州在舊的優勢失落之後，又逐漸形成了新的開放優勢，使廣州得以繼續處在中國開放的前沿。

近代廣州新的開放優勢由三方面因素構成：

第一，廣州自身的實力優。首先，近代廣州仍然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它集華南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優勢於一身，具有較大的聚合力 and 輻射力。其次，廣州是中國開放歷史最悠久的大商港，市民的商品經濟觀念與經商素質非常突出，社會趨利務實風氣濃厚，有與外商打交道的經驗，這使近代資本主義文明較為易於廣州人所接受。再次，廣州地處沿海地區，是全國兩大一級口岸之一，擁有良好的通商貿易和交通運輸條件。廣州所處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商品經濟發達，民生富裕，地方財政實力名列全國前茅，這些都為近代廣州的開放提供了良好社會環境和基礎。

第二，利用香港的開放優勢。近代廣東有句話，稱「省港不分家」。兩地人民在血緣關係、文化背景、風俗語言等方面極易溝通。英國人統治香港後，香港成為自由貿易港，在其殖民地化的同時，資本主義化和國際化的程度也日趨提高。近代許多國際訊息都是由香港傳入廣州的，使香港成了廣州人瞭解近代西方的窗口和主要渠道。香港本身也為廣州提供了一個東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實體，在與香港的交往中，廣州人較早地瞭解到許多近代新事物、新文化、新觀念。近代廣州與香港兩地在城市功能方面也有許多互補之處，形成了以廣州聯繫內地、以香港聯繫國外的內外溝通的相互連帶關係，兩地的公司都在對方設有許多分支機構，保持日常的溝通聯繫。因此，近代穗港兩地的特殊關係，使香港的開放帶動了廣州的開放，香港的國際化把廣州與外部世界聯繫得更密切了。

第三，發揮華僑的巨大作用。廣東是僑鄉，華僑資本對近代廣州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投資，即華僑直接投資在廣州創辦實業。近代廣州的工業、商業、旅業、房地產業、娛樂業和市政設施中都有大量華僑資本，許多華僑資本企業成為廣州的行業龍頭企業。另一種是

近代廣東有句話，稱「省港不分家」，香港成了廣州人瞭解近代西方的窗口和主要渠道。近代廣州與香港兩地在城市功能方面也有許多互補之處，形成了以廣州聯繫內地、以香港聯繫國外的內外溝通的相互連帶關係。

近代廣州的開放不像上海那樣較受西方國家的直接影響，而是主要依靠海內外華人的交往與溝通。

間接的形式，即大量海外的僑匯流入廣州，充實了廣州的民間資本實力，使華僑資本有可能轉化為本地資本，構成廣州近代民族資本一個重要來源。此外，海外華僑以及留學生還在引進近代科學文化和先進技術、瞭解國際市場訊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從上述幾方面因素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特點，即近代廣州的開放不像上海那樣較多地受西方國家的直接影響，而是主要依靠海內外華人的交往與溝通。港澳的國際化、海外華人華僑的支持和廣州本身的地方實力結合一起，形成廣州新的開放優勢。這是近代廣州的優勢所在，也是近代廣州的特點所在。因為有了新的發展支撐點，近代的廣州並沒有在自我封閉衰落，而是在新的開放中發展進步。它仍然是中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之一，在接受和傳播近代資本主義主明方面也走在全國前列。它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文化影響力較強，仍是近代中國幾個富有影響力的明星城市之一。

註釋

- 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頁69。
- ②⑩ 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82、28。
- ③ (日)濱下武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頁435、437。
- ④ 程浩編著：《廣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有關統計資料。
- ⑤ 黃逸平著：《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84。
- ⑥⑧ 根據歷年海關十年報告製作。
- ⑦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57)，頁389-390。
- ⑨ 廣州《中正日報》，1946年9月14日；廣州《大光報》，1948年7月10日；《廣州百年大事記》(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頁297、620、669。
- ⑪ 轉引(美)郝延平著：《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頁60。
- ⑫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2。
- ⑬ 《廣州的洋行與租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37。
- ⑭ 張仲禮前揭書，頁171；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出版社，1957)，頁125。
- ⑮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頁548。
- ⑯⑰⑱ 參見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一章，頁26。
- ⑲⑳ (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商務印書館，1961)，頁43、193。
- ㉑ 《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未刊稿)。
- ㉒ 《劍橋中國史》第十冊(台北：南天書局，1987)，頁280。
- ㉓ Rev. J. Macgowan: *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London, 1897), p. 304.
- ㉔ 關於太平天國起義對滬穗兩地發展的影響，可參閱朱弘先生的論文：〈近代上海的興起〉，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4年6月)總第23期。

樂正 1982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1989年獲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著作有《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